

<梁英明印尼生活回忆> 之二

我的表兄当时大约有16岁,他已经有力气娜狮头了,而我只能舞绣球。我们俩狮队的绣球不是用手拿住的,而是将绣球安装在一根木棍上,我要不断挥舞木棍,让绣球飞速滚动,引导狮子跟着绣球上下起舞。为了让舞狮活动更具有观赏性,商家往往用竹竿把红包高高挂起来,让狮子张嘴把红包存进去。我的任务就是要高举安装绣球的木棍,把狮子引到红包面前。狮子“吃”了红包后,就向商家拜谢。三通锣鼓之后,狮子就可以离开了。

当大人们清点收到的捐款时,都感到很高兴。我当时虽然还不懂得抗日救国的大道理,但是觉得自己能为祖国的难民出一点力,心里也感到很自豪。

日军铁蹄下的生活

1941年12月8日,日本空军突袭夏威夷珍珠港后,我从大人物的谈话中,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要“南进”,梭罗恐怕不能幸免了。小小年纪,对战争的残酷不会有什么认识。我每天照常上课,只记得家里的玻璃门窗都用纸条贴成了米字形,以防遭到日军空袭时,玻璃被炸碎伤人。同时,家里所有的电灯泡都罩上了黑布,也是预防日本空军晚上轰炸时看到地面目标。

但是,这样胆战心惊的生活没有过多久,日军也没有轰炸梭罗。大约因为梭罗只是一座小城市,没有什么战略价值吧。

1942年2月的一天,忽然听说日本军队快打到梭罗了。大家都不知道战火会不会烧到家门口,于是纷纷逃往乡村躲避。父母收拾好一点细软,便带着四个孩子和我的奶奶一起逃到郊外乡村。我们没有目的地,只是以为离开城市就安全。

中午,我们在乡下印尼人的小店里吃了一点东西,隐约听到从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枪炮声,不久就又逐渐恢复平静。到傍晚时分,听说日本军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便开进了梭罗市区,于是父亲又带着我们随着人流回到家里。

听说梭罗的荷兰人事先已经逃离,他们的家也被当地人洗劫一空,一些人扛着漂亮的沙发、桌椅、收音机和时钟等抢来的物品在街上叫卖。我们的家在华侨商店集

中的市中心,没有遭到抢劫,算是幸运。

至于早先听到的枪声,原来是日军敲打汽油桶和在汽油桶内燃放鞭炮发出的响声。这时,荷兰军队和前来支援抗日的澳大利亚士兵早已望风而逃,印尼人也不想抵抗。结果,日本军队竟然不费一粒子弹,用几个汽油桶就轻易占领了一座城市,真是令人哀叹。

占领梭罗的日本军队似乎人数不多。他们都驻扎在离我家不太远的一座荷兰军队的旧兵营里。此后,日军也许为了提振士气,也为了吓唬市民,几乎天天早上都有大约50名持枪的日本士兵,举着日本国旗和一面白布上写有“武运长久”四个红字的旗帜,列队在市区跑步,边跑边用日语高喊:

“一、二、三、四!”他们的皮靴踏在马路上的声音,听起来十分恐怖。这时,街上的行人都纷纷让到路边,我们自然也不敢走到街上,只能躲在门后偷偷观看。

日本占领梭罗后不久,听说逮捕了一些华侨抗日团体的领导人以及曾担任荷印军队军官的华人。我后来从老一辈人得知,梭罗有七名华人被捕入狱,他们是李赞冉、冯启明、李云程、吴家咸、魏松德、郭财源和曾永谋。其中,李赞冉先生是梭罗客属公会主席,也是在梭罗的中国国民党和抗日赈济会的主要领导人,他被捕后曾监禁在西爪哇的西冷(Serang)和芝马圩(Cimahy)集中营内,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获释。其余被捕的六人分别为战前中国国民党在梭罗的领导人以及荷印军成员。我父亲和李清波(玉融公会主席)均曾担任梭罗赈济会成员。父亲曾被日军当局传召审问,并遭日本军官掌掴,但幸未被捕入狱,算是逃过一劫。日军对华侨的残暴统治,使我在小小的年纪便开始萌生民族自强的意识。

日军占领期间,华侨兴办的华文中学一律被取缔,我就读的梭罗中华学校只有小学,因此获准继续教学,条件是不得开设英文课程,而要改为日文课。学校悬挂的中华民国国旗上端,要加一条黄布条,记得上面写有“和平建国”四个汉字,以表明学校归属南京的汪伪政权,而不是归属重庆的中华民国政权。

当时我还在读四年级下学期,本来已经学了将近两年的英文,这时也要改学日文

了。学校里的老师原来都不懂日文,日文课的老师都是事先经过日本人短期培训,他们学会几个单词,就来教学生,现学现卖,水平当然很差。加上学生对学日文有抵触情绪,也不愿意学,教学效果可想而知。不过,国文、数学、自然、体育等课程的老师还是很认真教学的。

最令人难忘的事是我们每周一早上的周会。星期一上课前,全校师生都要在操场上集合,面向日本东京的方向,首先一起唱日本国歌。我们也不懂得歌词是什么意思,只是跟着日语发音唱。唱完日本国歌以后,我们还要一起用日语高喊:“天皇陛下万岁”。日语“万岁”的发音是bansai,与闽南话“放屎”(pangsai)的发音很相近。于是,我们在喊“天皇陛下万岁”时,就故意放大嗓门喊“Tenoheika pangai!”(天皇陛下放屎!)喊完以后,同学们都偷偷发笑。校长和老师可能听出来了,但当时既没有日本人在场,也没有录音可查,这样的事自然没有人追究。

神的“杨老师”

日军南侵前,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党在东南亚各地华侨社会中建立了秘密的抗日组织。我当时年纪小,自然不了解详情,只是后来从父辈口中得知一二。

因为日本占领当局封闭了所有的华文中学,我在1944年6月小学毕业后就被迫辍学了。一天,父亲让我此后去一位“杨老师”家里补习国文。从此,我每尾期去上两个下午的课,每次两个小时左右,直到日本投降为止。

这位“杨老师”是一位中年人,个子不高,但身体很壮实,皮肤白皙细嫩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一看就知道他不是当地华侨。“杨老师”不会说印度尼西亚语,也不会说爪哇方言,他的夫人是一位土生华人,穿着纱笼。我不知道她是否会说汉语,因为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话,只是点头微笑,也不过问我上课的事。

“杨老师”似乎没有其他职业,他的学生也只有我一个人。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生活来源,只见他家院子里养着很多母鸡,可能是靠卖鸡蛋为生吧。我从未向他交学费,也不知道父亲给他多少报酬。

“杨老师”的国语说得很纯正,显然不是福建或广



梭罗华侨公学校长林维新老师

东人。他只教我读古文,教材就是一本《古文观止》。他对文章内容只作简要的讲解,然后要我背诵。我能熟练背诵他教过的一篇文章后,才教我学下一篇文章。我记得他要我背诵的第一篇文章是韩愈的《师说》,接着学的是《邹忌讽齐王纳谏》《宋玉对楚王问》《报任安书》《滕王阁序》《陈情表》《诸葛亮出师表》《谏太宗十思疏》《卖柑者言》《捕蛇者说》《陋室铭》等等,一共学了30多篇,每篇都要我能熟练背诵,才算及格。“杨老师”从不跟我谈时事,更不谈有关抗日的事,只讲解中国传统语言文化。最后几个月时间,却教我做社会调查的方法,如怎样设计调查问卷,以及如何分析调查数据,等等。当然,我实际上没有机会去做任何社会调查工作。

当时,我并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后来回想起这些事,才对这位“杨老师”的来历产生好奇心。无论如何,他决不是一个普通的国文老师。不过,他确实让我打下了国文的基础。

我家里有一部飞利浦收音机,但日本占领时期,当局曾将所有收音机的短波封死,禁止人们收听外国电台广播。我已想不起从哪里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到1945年8月底,父亲告诉我,以后不用再去“杨老师”那里补习了。我也从此跟他失去了联系。父亲没有告诉我停止补习是什么原因,只是不久以后,听说“杨

老师”已经离开印度尼西亚,我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

这时,我已经年满14岁,稍微懂得一点事,才从大人们谈话中听到有关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曾在印度尼西亚建立抗日组织的事。我想,“杨老师”显然是化名,他或许就是中国国民党抗日秘密组织的成员。他能隐蔽在梭罗,当然得到梭罗一些华侨的帮助和庇护。他到底姓甚名谁,父亲没有对我说过,我当时也没有追问。多少年之后,我才开始寻找他,但至今不知道他的身世和下落。我希望他当华在梭罗的时候,真是为抗日斗争做了有益的工作。

梭罗华侨公学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梭罗一些热心华侨教育的爱国人士立即筹备复办华文中学。我就在梭罗华侨公学招生的第一年考进了这所学校的中学部。因为我在小学毕业后曾补习过一些功课,因而顺利升入了华公初中二年级学习。我的弟弟也同时考入华公初一。

梭罗华侨公学创立于1927年,是梭罗著名的爱国华校。二战后复办中学部时,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印尼社会百业凋零,物资匮乏。当时,华公只有一所简陋的校舍,连操场、实验室和图书馆都没有。我上数学课需用的三角板和圆规,都是我从旧货市场上买到的。但是,华公的老师